

导读



推敲小细节 还原大历史

刘统：一个事情有多种角度的反映，有多种角度的材料。如何从这些材料中跳出来，拎出来一条线索，将宏观把握与细节的研究相结合，这非常重要。必须达到这样一个结合，研究出来的历史才是真正的信史。 ▶P24



金融时代的“逻辑学家”

陈志武：因为市场经济和现代金融，我们正在从传统的制约框架中解放出来，从“孔家店”和其他约束中解放出来。这不是出于我的个人偏好。客观地讲，金融市场是为每个人的解放奠定了基础，可以让我们实现自由的志向。 ▶P25

书屋

文学：另一种角度读鲁迅
社科：有多少人相信中国人发现了美洲
经管：用失败者的喟叹，唤醒新商业时代
电影：空无之韵 小津之味 ▶P26~29

书事件

诺贝尔文学奖的陌生人

■黄艾禾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新科得主又出炉了。米勒，一位讲德语的罗马尼亚女作家，完全陌生的名字。料想她的著作中译本会在不久的将来在中国面世，你会去买她的书吗？

回想1982年，哥伦比亚作家马尔萨斯因小说《百年孤独》获诺贝尔文学奖。那时的中国文学界一片激动，马尔萨斯的小说被到处转载，大家都去买《百年孤独》的中译本来读，去啃那些鬼怪奇诡的魔幻故事。中国作家们很快就写出自己的魔幻风格的文学作品。在我的印象中，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次。

在马尔萨斯之前，提起诺贝尔文学奖，大家还能知道苏联的肖洛霍夫，日本的川端康成，美国的海明威、斯坦贝克……而在马尔萨斯之后，199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中国人中也有知名度。

2001年，出生在西印度群岛的印度裔作家奈保尔拿了诺贝尔文学奖，2006年是土耳其的帕慕克。他们都算是生长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家，我们读他们的作品更能多一层理解，我周围的朋友有好几位去买了他们的书来读。可是，这几年还有奥地利的耶利内克，英国的哈罗德·品特、多丽丝·莱辛和法国的勒·克萊齐奥呢？我没有听什么人提他们，一片陌生人。这几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对我们来说，越来越陌生了。

到底是诺贝尔与我们远了，还是我们与诺贝尔远了？记得早些年，每到诺贝尔奖快评出时，大家都会有些议论，关于中国的哪位诗人哪位作家已经进入了候选名单的传闻也总能激起一些风波。到了现在，这些议论也不见了，倒是有一种说法比较时髦：凭什么我们要拿诺贝尔奖那么当回事，那就是几个瑞典人自己搞的奖！

是的，现在我们中国经济上来了，我们的GDP在世界排进前三甲，我们的奥运金牌是全球第一，如果我们没有拿到诺贝尔奖，那并不是我们不行，只能是诺贝尔奖不行了。

但是，我们还是那么在意诺贝尔奖。不但获奖的消息仍然占据着各媒体的庞大版面，而且获奖者是华裔的信息被提了又提，大家嘴上不说，心里恐怕还是那句话，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人能拿上诺贝尔奖？——原因也很简单，这个“几个瑞典人搞的”奖，就是有权威，就是全世界都公认，就是没法漠视。如果有一个中国人得了这个奖，就会有一种跻身世界主流之中央的自豪感。

我当然也希望有一天我们中国的作家能成为这个奖的得主，希望中国的作家成为世界文坛中的主流。但是，我不希望世界文坛的主流中只有我们中国这一种风格的东西。说实在的，每年看看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作家们的提名，你才知这个世界有多大。有好几十亿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也都有那么多的人生感念与冥想，有那么多的憧憬与梦幻，为什么只有我们中国人，才一定要生活在世界主流的中央？

成为世界的主流，不是靠拼死拼活地硬往上挤就能获得的，那要凭实力，更要凭心胸与眼光。真正站在世界之主流者，自然会对世间万物充满兴趣，包括对世界各个角落的那些“陌生人”。

历史书写中的“集体失忆”

■吴燕

当我写下这个标题的时候，我必须首先承认，如果不是因为《1944：松山战役笔记》和《父亲的战场》，我对“中国远征军”也许依然是一无所知。尽管这个名词并非第一次听到，但仅此而已，我不知道关于它的更多细节，更加不了解那曾是抗日战争史上多么惨烈的一段记忆。

既是读了便忍不住想要寻找更多关于中国远征军的资料，以弥补我那几近于零的阅读背景，于是上网搜索。在众多关于中国远征军的资料性条目中，有一条消息十分显眼，那条消息说的是，中国远征军老兵黄绍甫老人在看了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之后致信媒体记者说，“有不忍心继续看下去的感觉，它对驻印远征军完全是歪曲、诽谤，影响极坏！”为了消除该片为远征军形象带来的不良影响，黄绍甫自己已经动手创作电影剧本，以正视听。看罢心中暗忖，老兵的心情虽然可以理解，但电视剧毕竟不是历史教科书，原是认真不得的。正像大多数新闻一样，新闻跟帖常常比新闻本身更耐人寻味，也让人不由得要认真起来，比如这一段——“没有《团长》谁知道你们？谁会关注你们？被历史遗弃的‘英雄’？”这话乍听来颇有些刺耳，但当我看到《1944：松山战役笔记》的时候，却在它的腰封读到这样一句广告词——“《我的团长我的团》背后的历史真实”，这似乎为那句颇有些刺耳的评



论加上了一个注脚，也令人不得不相信，有时候听来刺耳的话很可能说出的恰恰是实情：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抗日战争史上最悲壮的一笔，其实也是缺失了太久的记忆，谓之“集体失忆”似乎也并不为过。

章东磐在《父亲的战场》中曾记述了这样一幕：“这样阔大的一片昨日战场，在这个本应被祭奠者挤满的日子里，除了我们，竟然再没有另一个来访者。访客们并不远，他们扶老携幼，花花绿绿地游走于丽江、香格里拉、大理、瑞丽和腾冲，在地热的温泉中欢快地沐浴，满足地哼唱着，享受着无忧的岁月。紧绷的出行计划赶上百万旅游者谁也没有时间来这里探一下头，来抚慰一下这残碑压着的六千多位都在青春岁月变成了鬼的异界灵魂。

他们为我们的今天而死，今天的我们却不记得他们了。”

从这个角度而言，《1944：松山战役笔记》与《父亲的战场》之问世，其意义首先就在于找回了这段缺失的记忆，将它安放在原就属于它的时空交错点上，也安放在我们关于历史的记忆中。

英国哲学家沃尔什曾在他的著作《历史哲学》中写道：“没有一个历史学家可能叙述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哪怕是在他所选择的研究范围之内；所有的人都必须选择某种事实作为特殊的重点，而把其他的统统略去……每一个历史学家显然都把一组利害、信仰和价值——它们显然对他所认为是重要的东西有着某种影响——带到了他的研究里面来。”而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一位颇有声望的美籍华人教授在上海讲学时就说过，在今天的美国大学中，谁要是还宣称他能知道“真正真实的历史”，那他就将失去在中学教书的资格。

真实的历史虽可追求，但终究是一个难圆的梦想。与“真实”相比，更重要的其实是“正视”，也更需要勇气。朱增泉中将在评价《1944：松山战役笔记》时认为此书“有两个突破，或称两个‘正视’：其一，正视国民党军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正面表现；其二，正视侵华日军在军事行动上的严密作风。这是历史的态度”。

记忆定义了一个人，标志着我们的身份；而历史之于民族，正如记忆之于个人。

争鸣

沉睡在记忆之海的70年代

■王洪波

面对历史，很需要一些想象力。

在读到《七十年代》之前，我几乎把70年代想象成一片文化的荒漠——无书可读，无学可上，何谈文化！但李零对他们这代人的概括是：“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七十年代》中的很多文章，都可看做是李零这个说法的注脚。不妨看看韩少功那时候的阅读书单是多么牛X：《麦田里的守望者》、《在路上》、《厌恶》、《局外人》、《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德热拉斯的《新阶级》，等等；也不妨看看张木生、许成钢等对时局的分析、对理论的思考走得有多远，今天看来，他们简直是当代中国的先知啊；还有时不时出现在北岛、徐浩渊、赵越胜等人笔下的地下诗歌群落、文化沙龙以及浪漫的游历，让今天的文青、艺青看到，也不免心向往之……

不过，一些人会“心向往之”，另一些人却会感觉不快——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毛尖小姐在其妙文《人头马的70年代》（《上海书评》2009年7月5日）中表达的。虽然毛尖小

姐表示“喜欢了解并且向往高端生活”，但对多数作者的“出身高眉”和下笔的“高高眉”，却感觉到“郁闷”，不满之情溢于言表。毛尖小姐提出了一连串的质问和批评：对于书中作者“只限于那些拥有发言权的社会阶层”，而没有“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李陀：《七十年代·序言》），毛尖小姐认为，“这样一个严重缺陷，不仅导致了北岛们突然成了多数派，北岛们的回忆失去了历史感”，“而更大的问题是……北岛是否还合适来主编这样一本讲述中国历史的回忆录？”“在《今天》和‘今天群’失去语境的今天，无疑也消散了其冲击力。所以，北岛的文章美则美矣，却也无力穿透我们今天更为复杂的存在”。

对北岛们写作态度的“高高眉”（如果确实如此的话）表示反感可以理解，那一连串批评的逻辑却让人看不明白。《七十年代》并不等于“七十年代史”或者“七十年代文化史”，而只是几十个文化人回忆文章的集子，有什么“多数派”、“少数派”的问题？书里未收“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文章，怎么就使得作者们的回忆也“失去了历史感”呢？北岛为什么就没有资格编这样一本回忆录？

要求北岛的文章要能“穿透我们今天更为复杂的存在”，这不是太严苛了吗？如今那么多高头讲章、鸿篇巨制中，能够“穿透我们今天更为复杂的存在”的，又有多少？

的确，关于70年代的历史书写，很难让人满意。正如李陀所说，有太多的东西仍然沉睡在记忆之海的海底，有待打捞。不用说底层民众是历史书写的盲点，就是文化人的遭遇也有太多未能笔之于书。比如关于70年代的地下诗歌，其中白洋淀诗群和《今天》的故事，已有几本书详加讲述，因而广为人知（这可能是北岛们努力的结果）；而贵州黄翔、哑默的诗歌写作和民刊《启蒙》的故事，似乎还没有公开出版物做细致的梳理。关于70年代的历史记述是如此缺乏，所以，对北岛们打捞70年代历史记忆的努力，不妨多一些鼓励——虽然不是不可以批评，但像毛尖小姐那样求全责备，只顾逞口舌之快，就真坐实了“乱来”二字。

最后补充一句，《七十年代》中，阿坚的《我在“四五事件”前后》一文，大幅修正了我对“四五事件”的既定印象或想象，有此一文，让我觉得，我为此书花费的银子是物有所值的。